

## 古碑证商埠 梦萦小苏州

——《阳江厅广州会馆碑记》探析

□ 陈计会

日前，闻悉《阳江厅广州会馆碑记》在太傅路展出，笔者立马赶过去，一睹真容。

此碑于2011年发现并有报道（详见《阳江日报》2011年2月28日报道），但石碑一直深藏于商家私宅，外人难以窥见。现政府将太傅路打造成文化街区，商家适时将石碑展出，有利于提升本地的文化底蕴。此石碑是阳江商业文化的重要物证，清晰印证了清代阳江商业的发达景象，及其在粤西乃至全省的重要商贸地位，对研究阳江清代商贸、文化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石碑出土时曾请诗联专家康斯馨先生断句、翻译，并作初步考证，笔者在此基础上试作补充，重点解读其承载的清代阳江商业辉煌。



↑《阳江厅广州会馆碑记》  
陈计会 摄  
←太傅路街景（资料图片）  
梁文栋 摄

## 碑记概况 碑刻形制与核心内容梳要

在太傅路中段仁心大药房旁边，笔者见到三块基本完好的石碑用底座固定在墙边。石碑黑底白字，字体刚劲秀美，除店名碑有个别模糊外，主体碑每字清晰可辨。

一块石碑是碑记主体部分，另两块附录记述三百多家店铺的芳名。这三百多家商号正是清代阳江商业繁荣的直接缩影。碑记没有落款时间，但从加入保良会友的名单中可知最早是清同治四年。碑文分别记述“同治四年保良会友芳名次序”“光绪五年再开保良会友芳名次序”“光绪七年再开保良会友芳名次序”“永安堂各店历年报季芳名次序”（落款为：光绪七年岁次辛巳正月二十日 永安堂谨识）“光绪七年已后续入会馆报季芳名次序”（落款为：光绪十八年岁次壬辰四月二十日 永安堂）等四批店名共340家左右。从同治四年（1865）至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，时间跨度27年，商号数量之多、延续时间之长，

充分彰显了清代阳江商业的持续兴盛。除店名外，具体碑文如下：

## 阳江厅广州会馆碑记

别五羊之郡，番禺云游；出二虎之门，估帆风利。男子四方有志，万里营生。始则人力所通，似张骞之凿空；继则人言所就，如帝舜之成都。莫不棋布星罗，徂至辐凑。而况地连广肇，州拓南恩，宾至如归，朋来无咎。何必陈相自宋，受一廛而为氓；孟子之滕，居上宫而为馆哉？

然而梓里相依，苔岑各契。涣而不萃，无以见相恤而相调也；疏而不亲，无以广同声而同气也。此地汉属高凉，渐开风会；隋当萧统，县置阳江。版图叠隶于高恩，沿革代更于唐宋。自绍圣五年而土城始筑，自洪武四年而又改砖城。编户者五十里有奇，分段者十二街相错。

而襟漠水，管辖于岗。峰倚将军，削云屏而颠弁；岭尊丞相，抗烟岫以抱坤。河濠镜于北津，坡插笋于顿顿。访宋时之故垒，暮巴巢鸟；拜张傅之荒阡，泥知负鼠。星移物换，几阅沧桑；人杰地灵，又丰屋菲。凤岭峨其秀，龙津发其灵长。五百年来，承平至今而为厅矣。

城犹百雉，塔耸长虬。村则鸡犬闻声，山则龟蛇守口。说者谓：利挽远客，货殖居民。故来此者，邂逅鸥夷，金分鲍叔。栖船过肆，九衢之通运多；舟帆津津，百粤之贸迁不少。高唐既伏，吾郡尤都。将此康乐和亲，殷昌繁衍，阜民财于舜日，给人足于尧衢。谁可以储乏公囊，集无斤事？

爰于第七间创成会馆。度地庇材，鸠工背构。梁扛玉女，帆收珠里之云；柱挂金仙，栋射华濠之旭。登斯堂也，恍然见：兴仁兴让，无许无虞。揆数百年未有之规，联十四属已

成之势。且藉以致民聚货，顿成冠盖之冲；问俗观风，上备轩轳之采者矣。

雄籍由广郡，辄振高要。泰分首籍之餐，敬话粉榆之旧。谨沿颓末，用志不忘。他日者，绵羊河口，叙舟而食鲜鱼；翠鸟山头，携琴而放仙鹤。寻北楼于万象，基址当存；叱怪石于双鱼，云根许割。铺经山口，客题黄竹之桥；渡过大墟，人载绿荷之饭。

望停云而把袂，坐对溪山；揖今雨以谈心，无非乡里。心乎爱矣，言敢忘诸？渐无绣虎之才，下笔漫惊风雨；愿并金鸡之石，勒碑永寿山河。

教授文林郎、高要县训导、壬戌恩科举人、辛未大挑二等 何又雄 顿首拜撰

关祝三刻并书

从碑文可知，作者为何又雄。据清宣统《南海县志》卷十五载：“何又雄号淡如，深村堡人，同治元年举人，

大挑二等，选高要教谕。又雄博览能文，尤工骈俪，谈谐善谑，往往以文道俗情，援笔立就。授徒省中，从游甚众。闲涉绘事，自饶风趣。晚任教职，数年，寻卒。”据说他因考场代人作“枪手”断了仕途，将原名“何又雄”改为“何双雄”，以授徒为业。

该碑文记述广州商人在阳江建会馆，重点记其缘起、地理、历史、商业盛况。文章从广州商人出海经商说起，用张骞、舜都、孟子居滕等典故，说明商人外出经商需要聚处、互助、联谊，建会馆是体现“同乡相恤相帮”的要义。紧接着写阳江千年的建制史，从汉属高凉县写到清建厅，铺陈阳江形胜与古迹，描写山川、旧垒，渲染地域底蕴。由于阳江商业繁华，广州商人较多，遂建会馆，设在“七间”。接着写到会馆功能，可以联十四属乡情，兴仁让、息诈虞。作者还联系自身追忆乡谊之情。结尾抒情，祝愿会馆长存、山河永固。

## 内容考证 地名疏释与史实辨析

此碑文涉及阳江诸多历史地理内容，尤其多处出现阳江地名，既有历史旧称，亦有撰文当时的称谓，这些地名多与清代阳江商贸、交通紧密相关，是解读其商业地位的重要线索，笔者试略作疏释。

**了岗：**民国《阳江志》称：“自望瞭山北出折东曰金钱山，东曰田螺山，又西北二里曰了岗。”也即现在了岗路附近。

**将军峰：**即将军山，在阳东区那龙镇和平村附近。旧驿道边，靠近黄竹桥。

**丞相岭：**即即官山（龙高山）西南之一峰，相传宋丞相留正绍兴中尝为阳江县尉，故名。（《清一统志》）现阳西县上洋镇双鱼城古驿道经过丞相岭，是阳江通往粤西各地的商贸要道。

**凤岭：**即大凤山，今名大放鸡山，在旧驿道边。民国《阳江志》载：“大凤鸡山在城东二十里，高二百余丈，峰峦嵒嵒，一方之望，邑城之祖山也。其山横峙，势若展旗，官山即其东角。宋尚书李乔水之墓在焉。”

**绵羊河：**即石滩河，在今江城区埠场镇关村附近。民国《阳江志》云：“绵羊河，一名石滩，在城南二十里，受罗琴山东合冈之水，至关村入于西河。（《李志》）绵羊浦水，源出合冈东南，非受合冈水也。（《采访册》）”作为漠阳江支流，是清代阳江水陆商贸转运的重要枢纽。

**金鸡石：**民国《阳江志》称：“（北山）又北半里曰金鸡石。”《舆地纪胜》引《郡国志》云“石上每有鸡，见金色。鸣于石上”。乾隆《阳江志》云：“金鸡石在城北小洲上，相传宋时有金鸡飞立石上，追者至，坠于水，因立庙石侧。石刻‘金鸡古迹’四字。”现石刻存放在金鸡寺。

**双鱼石：**指阳江双鱼城的怪石，古城东门有石鼓，西门有石鸡（后修路炸毁），南门有石狗，北门有石人。

**翠鸟山：**唐《元和郡县志》卷四十六载：“翠鸟山，在（阳江）县东二十里。”民国《阳江志》称，大凤鸡山在城东二十里，亦称飞鹤山，凤与鹤皆鸟形，疑翠鸟山即此。碑文中说“翠鸟山头，携琴而放仙鹤”，又似指罗琴山。

**黄竹桥：**乾隆《阳江志》卷二载，黄竹桥在山口铺前。今阳东区那龙镇和平村，将军山旁，是古驿道必经之处。明孙承泽《春明梦余录》卷四十三载：“肇庆西恩平、阳江、会处鹿围、黄竹桥，仍高、雷、廉、琼之要冲”，足见其在广东西部商贸通道中的重要地位。

**山口铺：**在今阳东区合山镇黄竹桥附近。是阳江东路驿道一个驿铺。康熙二十年《阳江志》卷之一载：“东路：自县前总铺十里至长亭，又十里至官山，又十里至那藤，又十里至凭凭村，又十里至甘濠，又十里至莲塘驿，又十里至山口，又十里至那龙，又十里至那柳，接恩平阶山铺。”这条驿道是阳江连接广府、辐射粤西的重要商贸通道。

**大墟渡：**康熙二十年《阳江志》卷一载：“大墟渡，在县西九十里，康熙十三年新造渡船。”民国《阳江志》卷十载：“大墟渡，在大墟汛前，今建桥，渡废。”此渡应在现阳江程村黄竹桥附近。是清代阳江通往电白、高州等地的商贸渡口。

**珠里街：**指珠里街，阳江城外十二街之一，为阳江古商埠核心区域，商铺林立，货物云集，所以文中才有“帆收珠里之云”的生动描述，是清代阳江商业繁荣的直接见证。

**十四属：**指清代中晚期广府所领的14个县（即“广属十四县”），包括：1.南海县（今佛山南海、禅城）2.番禺县（今广州主城区、番禺）3.顺德县（今顺德）4.东莞县（今东莞、深圳、香港）5.从化县（今从化）

6.龙门县（今龙门）7.新宁县（今台山）8.增城县（今增城）9.香山（今中山、珠海、澳门）10.新会县（今新会、江门）11.三水县（今三水）12.清远县（今清远）13.新安县（今深圳、香港）14.花县（今花都）。广府十四属商人纷纷来阳江经商，足见阳江在广东商贸格局中的吸引力。

**十二街：**清代中期至民国阳江城外十二条商业繁华的街区。阳江城外沿漠阳江设七大门防隘（大闸至七间）。其中二至七间为独立街市，加大闸（水街）、龙潭（旦场街）、珠里、大埠头、渔洲、麒麟，共十二条主街，故称“十二街”。这十二条街区商铺鳞次栉比，涵盖绸布、酒米、药材等各类行业，是清代阳江商业发达的核心标志，也是粤西地区规模最大的商贸聚集区之一。

文中还提到“洪武四年改砖城”，这与《阳江志》“洪武三年”说法有出入。为此笔者找到同是明代编的《肇庆府志》（崇祯版），也是说“洪武三年”，碑文疑弄错，或另有所本。

该文是清代中期散散相间的馆阁文体，用典精审。精准描绘清代阳江自然与人文景观，对山川形胜和古迹遗址的描述比方志更生动、系统，可视为清代阳江山水志，为地名考证、旅游开发、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依据。关祝三书丹并刻，为晚清岭南碑刻书法实物。关祝三不见记载，是否书法家关祝龄（三辅街人，宣统元年己酉科拔贡朝考一等第九名，山东补用知县），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
门外依然是喧嚣的街市，而一块穿越百年风尘的石碑静静地诉说着岁月的荣光：远去的帆影、码头的喧闹、伙计的吆喝、讨价还价的声浪无不溢出碑文，让人恍若重回当时的场景，真切感受到清代晚期阳江作为岭南商业重镇的繁华与活力。

## 碑记价值 解码清代阳江的历史密码

《阳江厅广州会馆碑记》是研究清代阳江历史、商贸、地理、社会与文化的核心文献，其重现天日极大填补了地方史料空白，其中最具价值的，便是对清代阳江商业发达景象及其在广东历史地位的清晰印证，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## 商贸佐证

阳江自隋唐时开商埠，被称为“远郡之沃饶者也”。宋代“吴越所产之物，不乏于斯”（《太平寰宇记》）。明代阳江县的“富商巨贾常带脚步船泛海抵琼崖文昌、会同（琼海）等处，采买胡椒、椰子，旬日往还，息辄数倍。南、番、新、顺之人，辐辏营生”。（康熙二十年《阳江志》）清代商业更加繁荣，中晚期在城外形成商业的十二街区，成为粤西商业重镇。此碑记述的正是当时商业情况。明清乃至民国，在阳江经营生意的，多为广府人。关于当时的客商，阳江流传这样的俗语概括：“南（海）、番（禺）、顺（德）、香（山），清（远）、水（三水）、化（从化）成龙。”

碑文称：“利挽远客，货殖居民”“商廛既伙，吾郡尤都”，进一步证实阳江是粤西沿海枢纽、“小苏州”级商埠。

## 交通见证

阳江在唐宋时期就是“当五州之要路”，明清驿道进一步拓展，形成东西走向的由广州、恩平至阳江往粤西和南北走向的由肇庆、新兴至阳春、阳江往粤西的两条驿道，并在阳江东安驿汇合成一条古代交通大动脉。碑文称：“别五羊之郡，番禺云游；出二虎之门，估帆风利”“帆收珠里之云”，这是指从海路来阳江，并在阳江城外漠阳江边的古商埠上岸。碑文称“铺经山口，客题黄竹之桥；渡过大墟，人载绿荷之饭”，这是阳江陆路交通写照，其中“山口铺、黄竹桥”是恩平往阳江驿道的重要节点，“大墟渡”是阳江往电白驿道的重要渡口，另外“绵羊河口，叙舟而食鲜鱼”中的“绵羊河”，是水陆交通的节点。因为清代中后期，从广州经阳东（莞）、顺（德）、香（山），清（远）、水（三水）、化（从化）成龙，下

船至漠阳江支流石滩（绵羊河）上岸陆行，这是当时往粤西的捷径。（详见本报2025年12月21日《粤西咽喉：阳江驿道历史变迁探究》）这证明当时阳江水运网络：漠阳江——西江——广佛——南海的跨区域商路。

## 建制实证

碑文系统梳理了阳江从汉代至清代的建制脉络。汉为高凉郡，隋萧铣时置阳江县，宋绍圣五年始筑土城，明洪武四年（或为三年）改建砖城，清代升级为阳江厅。同时记载清代阳江城区编户五十里、十二街相错。这印证了当时阳江城外十二街区是核心商业区，与现存历史街区吻合。

## 自治缩影

会馆的设立源于“涣而不萃，无以见相恤而相调”，广州府商人为了抱团、互助、维权、联谊而设立。主要功能是议事、祭祀、宴集、义葬、助学。由碑记芳名榜可知，在会馆设立之时或之前，广府商人已在阳江成立“保良

会”。最早的保良会是咸丰四年（1854）由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（字廷后，号镜泉先生）成立。其时太平天国起义，一些无良地痞恶棍乘机作恶。面对匪患，梁维清在村里成立保良会。保良会，顾名思义，是为保护良善百姓而设。谭嗣同称“良乃保，不保不良，而良益保，不良大惧，进而良，亦何必徙，其乡以无有博，而盗贼因弗施。”（《赠梁莲洞先生序》）保良会原先是为保护乡村社会安定的自治组织，后来延伸到外出经商的广府商人在异乡的自助、自保组织，并有慈善功能。阳江保良会开展情况不得而知，但从“芳名榜”上可知，有先后四批约340家店加入“保良会”，可见其影响广泛。保良会可看作商会组织的前身。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），阳江县于太傅祠创设商务公会，商会重点是组织商团武装，维护治安；组织消防队；赠度赠药，救饥救贫。宣统三年（1911）辛亥革命军进攻阳江，清阳江驻军头目符开铭要商会筹饷6000两白银作为调防费，否则纵火焚城。情急之下，阳江商会议事陈河（南海人，“存仁堂”药行经理）慷慨捐资6000两白银，用两个竹箩装好，派两个人抬送过

去，解救全城百姓，深受人们爱戴。（谢彦伦《阳江商源及其组织和主要活动》）

## 文史价值

该文是清代中期散散相间的馆阁文体，用典精审。精准描绘清代阳江自然与人文景观，对山川形胜和古迹遗址的描述比方志更生动、系统，可视为清代阳江山水志，为地名考证、旅游开发、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依据。关祝三书丹并刻，为晚清岭南碑刻书法实物。关祝三不见记载，是否书法家关祝龄（三辅街人，宣统元年己酉科拔贡朝考一等第九名，山东补用知县），有待进一步考证。

门外依然是喧嚣的街市，而一块穿越百年风尘的石碑静静地诉说着岁月的荣光：远去的帆影、码头的喧闹、伙计的吆喝、讨价还价的声浪无不溢出碑文，让人恍若重回当时的场景，真切感受到清代晚期阳江作为岭南商业重镇的繁华与活力。



阳江城十二街区图（民国《阳江志》）



芳名榜碑 陈计会 摄